

争鸣与书评

【编者按】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代表作《漫长的 20 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于 1994 年首次出版,该书运用布罗代尔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方法,考察了七百余年来资本积累与国家形成之间的变化,构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周期理论,被誉为阐述和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演变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经典之作。美国激进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于 1996 年撰写了《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当代经济停滞》一文,提出了有关《漫长的 20 世纪》的三点批评,阿里吉于 1997 年回应了波林的三点批评,波林此后又进行了简短的再次回应。这三篇文章构成了阿里吉同波林之间围绕《漫长的 20 世纪》的一场重要学术辩论,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三大核心议题:金融扩张的运行机制、霸权更迭的因果逻辑及其研究方法论。这场辩论不仅展现了马克思经济学阐释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生命力,更揭示了历史制度分析的重要性,还为我们理解 21 世纪金融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重要洞见。正如波林在《再次回应乔万尼·阿里吉》中所言,“这场纸上辩论在激荡思想之余,也照见了某些真知”,本刊特译介此组文章以飨读者。

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当代经济停滞^{*}

罗伯特·波林/著 张雪琴 邱昊龙 陈模玲/译^{**}

将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划分为两大时期现已几无争议。第一大时期为二战后一直持续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其典型特点在于经济高速增长、低失业率、经济波动较小以及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白人男性群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第二大时期为 20 世纪 70 年代初持续至今的“铅时代”(The Leaden Age),其典型特点在于经济增长缓慢、高失业率、经济波动严重以及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或不断下滑。这一根本性经济巨变亦重新定义了西方政治。“黄金时代”的诸多成功当时被归因于政府对市场的大规模干预,这类干预旨在缓解经济的严重波动以及战前资本主义在财富、收入和机会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平等。随着“铅时代”的到来,处于支配地位的“大政府”制度让位于日益崛起的“撒切尔-里根”主义,后者无条件地支持大企业且同样无条件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向下再分配。

“黄金时代”到“铅时代”这场巨变的突出特征之一在于金融市场及其活动的变化。“黄金时代”的特点是实际利率低、私人债务水平不高、金融市场投机交易相对较少,且金融总体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性。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国内经济中还是在拥有更广阔空间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广泛的政府干预均普遍

^{*} 文章发表于《新左派评论》1996 年第 219 期第 109-118 页,英文出处参见:Robert Pollin, Contemporary Economic Stagnation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Left Review* 1/219, September-October 1996。——中译者注

^{**} 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 1950—)系美国激进经济学家,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研究所联合创始人,以对金融扩张、收入分配、绿色经济及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著称,曾于 2013 年被《外交政策》杂志评选为“全球一百位大思想家”之一;张雪琴(通信译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E-mail:chicagousz@163.com;邱昊龙,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模玲,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译者注

引文格式: 罗伯特·波林. 2026. 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当代经济停滞[J]. 张雪琴,邱昊龙,陈模玲,译. 政治经济学季刊,5(1):153-163.

Cite this article: Pollin R. 2026. Contemporary economic stagnation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Zhang X Q, Qiu H L, Chen M L, trans.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5(1): 153-163. (trans. in Chinese)

存在,其中国际货币市场政府干预主要通过以固定汇率制度为典型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进行。推行政府干预政策的理由不难找到,因为投机性金融市场的破坏性力量——这尤以 1929 年华尔街股灾为最——是经济大萧条的主要肇因。

相形之下,“铅时代”的特点则是实际利率前所未有地攀升、私人债务水平回升、投机性金融市场活跃度复现以及金融危机频繁出现——最近一次则是由墨西哥比索崩溃而引发的 1995 年 12 月危机^①。同“铅时代”金融模式相伴随的则是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逐步取消,其中又以 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解体为典型。“铅时代”投机性金融活动复现和金融监管的弱化也为金融资本家优先关注紧缩货币、高利率和低通胀创造了条件,从而确立了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可接受范围。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漫长的 20 世纪》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如其副标题所示,它旨在阐释“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而这正是资本主义从“黄金时代”到“铅时代”转变的具体历程^②。这项研究的论证前提即是当前时期确实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场巨变。然而,这一巨变本身也是西方资本主义自 14 世纪以来即已存在的常态。因此,有必要参照既往转型过程来评估当前,以理解产生变革的力量以及这场变革的最可能结局。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③,阿里吉则致力于让这些幽灵般的联系在光天化日下现原形。

漫长世纪中的金融扩张

阿里吉认为当前时期很可能是贯穿“漫长的 20 世纪”这一历史过程的终结。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两大根本性变化构成了漫长 20 世纪的起点:一是英国衰落和美国崛起为资本主义霸权大国;二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首次经历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持续至 90 年代中期的长期经济衰退。阿里吉提出 20 世纪 70 年代构成了这一漫长世纪终结的开端,因为这时我们开始观察到金融资本权力的不断上升和投机性金融活动的日趋蔓延。事实上,阿里吉研究的一大核心论点即是这类“金融扩张”时期标志着现行资本主义秩序“秋天”的来临,并会逐步

① 墨西哥比索危机系 1994 年 12 月 20 日因比索贬值引发,通常按照爆发标志称为 1994 年墨西哥比索危机,不过这场危机的核心冲击及其应对贯穿了 1995 年,此处作者可能笔误,应为 1994 年 12 月危机。——中译者注

②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1994. 阿里吉本人并未使用“黄金时代”和“铅时代”这类术语,它们主要来自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论经济增长的广泛研究。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69 页。——中译者注

让位于某种新秩序。阿里吉认为,贯穿“漫长的 20 世纪”的转型模式与此前三个“漫长世纪”——热那亚主导的 16 世纪、荷兰主导的 17 世纪和英国主导的 19 世纪——具有可比性。他在研究结束之际提出的问题是: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日本资本主义及相应的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崛起是否将取代美国霸权。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系首位提出下述观点的学者,即每一漫长世纪都以金融扩张“秋天”的出现为典型特征。然而,布罗代尔对这一分析模式所提出的问题远甚于其所能回答的。金融扩张与漫长世纪之间的更迭究竟存在何种关系?阿里吉接纳了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有关布罗代尔的尖锐批评,即布罗代尔从未对他所观察到的上述关系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说,蒂利认为布罗代尔提出了诸多相互替代甚或彼此冲突的解释,以致完全不能对此提出任何严谨观点^①。尽管如此,阿里吉坚信布罗代尔确实揭示了资本主义在漫长周期演化中的某种根本图式。因此,《漫长的 20 世纪》旨在为理解布罗代尔所发现的图式提供一个更为一贯的分析框架。阿里吉写道:“我让布罗代尔在世界史实的汹涌大海上迎风破浪,而给自己挑选了一个很轻松的任务,把他提供的十分丰富的设想和阐释整理加工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崛起和全面扩张的一个简洁、前后一致和言之有理的解释。”^②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阿里吉研究目标的窄化。相反,《漫长的 20 世纪》具有全景式视野,涵盖了极其丰富的主题。阿里吉最基本的关切在于探讨同四个漫长世纪相对应的四大“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的内在动力。这尤其包括对下述过程的解释:在四大周期中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经济增长轨迹的主导特征。

然而一旦讨论该问题,自然会出现一系列其他问题。其中之一即是阿里吉对漫长世纪与金融扩张的分析同现有大量基于康德拉季耶夫有关资本主义积累长波概念的文献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问题。阿里吉认为有关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ff waves)及其“长周期模式”的文献过度关注价格随时间的周期性变动。他认为这并非某种有效的研究进路,因为它轻易回避下述核心问题:资本主义内在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催生长周期。据此,阿里吉提出了作为理解资本主义长期发展替代方法的历史绘图法,因为它提供了“比长周期或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更加令人信服地、更加可靠地说明现代世界体系中最

^① 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1984, pp. 70-74.

^②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1994, p. xi; 中译文采用姚乃强等译本,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著,《漫长的 20 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iv 页。——中译者注

具资本主义特色的东西”^①。

阿里吉的研究聚焦于四大体系积累周期中相继占据霸权地位的国家/政体: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也自然而然地将其置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近著《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所代表的学术脉络中^②。阿里吉旨在为此问题提供迄今最彻底的分析框架。他的研究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其长期秉持的“世界体系”视角。不过他也吸纳了某些出人意料的理论洞见。其中包括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的历史模型,该模型认为重商主义通过降低贸易风险而发展;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有关现代公司本质上是最小化交易成本工具的观点;以及当代关于“弹性专业化”作为新兴高生产率形态的相关论述,它们构成了对大公司制的挑战。

此外,所有这些主题根本上仍然是为了解释当代并展望未来。因此,阿里吉将其分析进一步推向了系列重要争论,其中包括二战后的冷战如何助推进而削弱美国霸权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根源、东亚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及当前“铅时代”中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源等议题。毫无疑问,阿里吉完成了一部视野恢宏的学术巨著。有鉴于此,我们理应认识到他不可能在处理所有相关议题时都获得同样成功,也不可能构建出一个在所有层面都一以贯之且具说服力的分析框架。那么,他此番努力的利弊短长究竟如何?

组织结构与霸权力量

阿里吉在领土支配与经济组织形式的关系上提出了某些具有挑衅性(provocative)的理论洞见。他认为,区分四大体系积累周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霸权是通过“外延式”还是“内涵式”控制模式来实现的。他提出热那亚与英国的霸权得益于成功拓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领土范围;而荷兰与美国霸权则属于“内涵式”控制模式,其本质在于通过对既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重组深化而非空间扩张以实现霸权更迭。

因此,世界体系就在外延式霸权和内涵式霸权之间交迭。每种控制模式的弱点终将超越其优势,从而为新的积累体系和新的霸权开辟空间。热那亚和英

①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1994, p. 7; 中译文在借鉴姚乃强等译本基础上略有修改,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著,《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页。——中译者注

②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7.

国体系要求它们能够在日益扩张的被征服领土上维持其政治和经济控制,而这种能力注定面临极限。相应的,以重组既有帝国疆域为主要控制模式的荷兰和美国体系,一旦重组变得过度压抑且压制,它们在巩固权力时同样会面临极限。但是这些极限究竟何时达到?

对此,阿里吉富有成效地借鉴了各种不同的企业组织理论并提出了新洞见。他提出,大英帝国正是围绕今天所谓“弹性专业化”体系组织而成。其特点是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整合而成的全球中小企业网络,国家在其中同时充当英国企业的保护人和中转站,“通过成为世界主要的商业和金融中转站,大英帝国为在其霸权所辖经济空间和制度疆域内建立的企业创造了独特机遇,使其得以专业化从事高附加值活动,从世界任何碰巧更便宜的地方获取投入,并将其产品销往任何碰巧能卖到最高价的地方”^①。

然而,这一体系的弱点恰恰在于:其在成功扩张领土的同时也暴露出霸权内部日益扩大的空隙,从而使与之竞争的资本主义企业趁虚而入。一旦竞争对手站稳脚跟,激烈的价格战便随之产生,即便是霸权国英国的企业也难逃冲击。因此,阿里吉认为,英国“弹性专业化”体系所固有的扩张性,为竞争型资本家创造了压低价格的机会,最终引发了 19 世纪 70 年代的价格通缩与萧条。

德国尤其是美国的公司组织形式(form of corporate organization),正是为解决资本主义过度竞争的某种方案而兴起的。正如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所言,现代公司制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通过重组取代了那种由自由市场将众多小型企业松散联结起来的旧体系。企业重组将形形色色的企业群体置于少数垄断大公司的控制之下。成功的垄断公司由此得以降低交易成本,并为其最终产品设定价格且维持高价。这终结了英国积累体系末期所引发的激烈价格竞争与萧条局面,并为美国主导的体系积累周期铺平了道路。

然而,我们能否断言,积累危机源于历任霸权国家所依凭的经济组织模式之耗竭?阿里吉几乎认同了这一判断,例如他曾写道,“我们在分析体系积累周期的过程中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每次物质扩张都是以一种特定的组织结构为基础的,而这种组织结构的生命力又渐渐遭到扩张本身的破坏”^②。然

①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1994, p. 284; 中译文在姚乃强等译本基础上略有修改,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著,《漫长的 20 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365 页。——中译者注

②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1994, p. 226. 中译文采用姚乃强等译本,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著,《漫长的 20 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91 页。——中译者注

而,阿里吉并未将此贯穿始终。事实上,恰恰在试图构建体系积累周期从扩张阶段转向收缩阶段的清晰因果解释链条时,阿里吉的论述出现了某种断裂。

例如,在解释漫长 20 世纪中美国霸权的衰落时,阿里吉并未将其有关组织结构的分析贯穿始终。当代有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其源头可追溯至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1932 年有关现代美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典研究——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衰退归因于公司组织形式日益低效。事实上,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他不仅是这一研究进路的重要贡献者,同时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敌意收购浪潮学界最主流的鼓吹手——就将此过程视为金融势力将以更集中的组织与所有权安排取代现已耗竭的公司组织形式的手段^①。换言之,在此视角下,组织结构与“金融扩张”之间的关联构成了分析主线。阿里吉完全未提及这类文献,更要命的是,他未能提出逻辑一贯的立场。相反,他在两种无法调和的观点间摇摆:一种认为美国的公司组织形式确已变得低效;另一种则认为,竞争对手(尤其是东亚)在类似组织结构下运转得同样好甚至更为高效。

金融交易与利润来源

阿里吉对金融扩张本身这一他最为关切的根本问题的论述同样呈现出连贯性:他识别出重要的历史模式,却未能将其纳入连贯自洽的分析框架中加以发展。沿袭布罗代尔,阿里吉有效利用了下述基本事实:任何资本主义秩序的首要需求都是为资本家创造灵活性或流动性。这使资本家能够在不必投身于任何特定业务领域的前提下最大化其利润机会。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存在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然而,正如凯恩斯所雄辩地阐明的那样,流动性金融市场也诱使投资者转向短期投机行为,因为它割裂了企业所有权与对生产性活动进行盈利性管理之间的联系。由此推知,当特定积累体制“秋天”降临之际,金融扩张便会接踵而至,因为资本家被迫日益寻求新的盈利性投资渠道。然而,金融扩张也会随之产生破坏稳定的反馈效应,诚如凯恩斯所言,其程度足

^① 基础性参考文献包括 Adolph Berle and Gardiner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1932; Michael Jensen, 'Eclipse of the Public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67, no. 4, 1989, pp. 61-77. 关于詹森(Jensen)观点的精彩评论参见 James Crotty and Don Goldstein, 'Do us Financial Markets Allocate Credit Efficiently? The Case of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in the 1980s', in G. Dymksi, G. Epstein, and R. Pollin, eds, *Transforming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Equity and Efficiency for the 21st Century*, Armonk, NY 1993, pp. 253-286.

以使企业沦为投机漩涡上的泡沫^①。相较于布罗代尔的原初贡献,阿里吉对该过程在四个漫长积累周期中的运作提供了更为系统的描述。

然而,究竟何为金融扩张?它们在历史转型中究竟如何作为因果运行?阿里吉对这些问题并未加以澄清。他把金融扩张描述为“某种态势的征兆,在那种态势下,把钱投向贸易和生产的扩张,不再像纯粹的金融交易那样,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增加朝着资本家阶层的现金流目的”^②。然而,此处“纯粹的金融交易”一词纯属概念虚晃,且在全书任何一处——尽管书中多次以不同形式重复此段论述——他都未给出更清晰的阐释。

当阿里吉试图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循环公式挪用到其长周期模型时,这种理论模糊性变得愈发明显。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描述为:资本家以货币(M)为起点,继而或购买既有商品或为新商品生产融资(C),最终目的则是出售新获商品以攫取利润,即实现货币增殖。因此,基本循环是货币→商品→增殖货币($M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M'$)。就此公式可见,资本家对其所购买或融资生产的新商品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毫无兴趣,只对售出它们所能获得的利润感兴趣。有鉴于此,资本家的理想状况便是直接从货币流转中获利,即实现货币自我增殖($M \rightarrow M'$),而无需经历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此类情形似乎正体现了许多“纯粹金融交易”的特征,例如发生在股票、债券或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其中仅有金融资产被买卖,但所有交易者最终似乎都变得更富有。

阿里吉挪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将每一长周期划分为两大阶段(phase)。他将第一阶段称为“物质扩张”,视其为马克思货币转化为商品阶段($M \rightarrow C$)的等同物;第二阶段发生于物质扩张衰退、金融扩张崛起之际,视其为马克思商品转化为增殖货币阶段($C \rightarrow M'$)的等同物。然而,这种挪用遮蔽了马克思框架的深层逻辑以及长周期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大阶段运行的根本法则:无论在哪一阶段,资本家的初始货币投资必须在过程终了时创造出更多货币,即利润。资本主义危机界定的标准正在于整个系统无法充分实现该目标。

只有在此框架下,我们才能有意义地探究金融扩张过程,或者更具体地理解“纯粹金融交易”—— $M \rightarrow M'$ 循环——何以能持续成功运行。然而,阿里吉

① 值得注意的是,高鸿业在译介凯恩斯《通论》时,将介词“on”译为“中”,这里我们译为“上”,这样能够更好体现阿里吉有关企业生产性活动与投机金融性活动的分离隐喻,强调了企业被投机金融性逻辑主导,从而失去了生产性根基,沦为只是浮在投机表面上的脆弱泡沫,这也反映出阿里吉认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癌变,而非资本主义的常态。参见:[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2页。——中译者注

②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1994, p. 8. 中译文采用姚乃强等译本,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著,《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0页。——中译者注

从未明确提出关于 $M \rightarrow M'$ 循环的最根本问题：倘若利润不是来自商品的生产与交换，那又从何而来？

究其实质，金融交易持续获利存在三种基本解释。首先，利润可能源于一些资本家赚钱而另一些亏损，这本质上是利润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再分配。在此情况下，所谓的“金融扩张”仅适用于那些足够幸运或人脉深厚、从而处于交易赢家一方的资本家。然而，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纯粹金融交易并不构成利润扩张。

其次，在纯粹金融交易过程中，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强制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财富与收入再分配。资本家继而通过金融市场操控手段，为争夺由此增加的可用利润而相互厮杀。这一情形在当代金融扩张阶段频繁上演，例如在众多公司并购案例中，交易双方均因股价上涨或股息增加而获益，原因即在于公司新东家通过背弃对工人群体和社区的既有承诺，压低了工资与税负。类似的向上再分配情形也适用于诸多历史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政府为向债权人偿还未偿公共债务而压榨本国民众。

第三种方式在于，如果资本家将资金从利润较低的物质生产与交换领域转移至利润较高领域，金融交易就能持续获利。这与阿里吉所描述的历史模式关联最为紧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关键因素并非金融交易本身，而是为生产性活动融资找到新获利模式，换言之，纯粹金融交易的 $M \rightarrow M'$ 循环之所以能够成功运行，仅因其底层是一个重新有效的 $M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M'$ 循环。阿里吉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从漫长的 $M \rightarrow C$ 循环转向漫长的 $C \rightarrow M'$ 循环，此论断纯属混淆。更一般地讲，阿里吉若能在 $M \rightarrow M'$ 交易中区分三种不同的利润来源，其历史叙事将大大受益。

资本主义“顶层”视角

阿里吉在此问题上之所以缺乏清晰性，部分原因或许在于他选择将研究聚焦于其所谓的资本主义秩序内部的“顶层”活动，即政府、商业和金融精英之间为领土、权力和利润而持续争斗。此种研究策略遵循了布罗代尔颇具挑战性（provocative）的概念，即资本主义过程本身实际上只在这个顶层运行。在布罗代尔看来，自给自足的物质生活下层与非等级制的市场交换中层，是在掠夺性资本主义（predator capitalism）顶层之下运行的。尽管布罗代尔和阿里吉都充分认识到，若无底层之存在，顶层亦不复存在，然而显而易见，仅仅关注顶层本身，很容易导向下述观点：即便对整个系统而言，利润也可以仅仅通过各种未具体说明的 $M \rightarrow M'$ 金融操控手段维系。

阿里吉对资本主义顶层活动的关注还造成了另一系列分析困难。这体现在他对所谓“反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的处理上^①。该问题在其关于漫长的 20 世纪本身的讨论中尤为突出——若要考量此类运动对资本主义轨迹的影响,则需纳入社会主义与冷战、社会民主主义与福利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反帝斗争的影响。将阿里吉的处理方式同霍布斯鲍姆(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中提出的“短 20 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加以比较颇有必要。霍氏将 20 世纪定义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苏联解体,如今回顾可见,这构成了一个已然终结的、连贯的历史时期”^②。一言以蔽之,霍氏将社会主义挑战及相关议题视为其 20 世纪叙事的根本塑造者。

阿里吉似乎并未在根本上反对霍氏的判断,其叙事本身也并未忽视来自左翼的种种挑战。问题在于这些挑战在其分析框架中格格不入。例如,阿里吉认为冷战相关的军事开支对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贡献卓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到美国从越南逐步撤军的 23 年间。然而他似乎并不将苏联解体视为界定其 20 世纪终结的事件,至少肯定不像东亚崛起那样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纵观《漫长的 20 世纪》全篇,我们可将其理解积累体制转型之法与其自身优劣作一类比。阿里吉的首要目标是将布罗代尔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铺陈叙事整合提炼。他已成功完成此任务,其分析框架颇具启发性(illuminating)——总体而言,它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长周期,特别是揭示长周期、霸权体制演化与金融扩张过程之间的相互关联,尤其是这些过程如何阐明当代局势。然而其“集约式”(intensive)整合框架过于局限,难以涵盖过去六个世纪所生成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所有核心要素。此外,阿里吉虽认识到其整合工作需要以明确的理论工具为基础,但在运用其所选理论工具时失之审慎,这或许是由于驾驭此等宏大工程着实困难。

然而,问题不仅在于阿里吉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方法。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他试图用一个相对僵化的分析模型维系关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的叙事。这种方法论与日益广泛的共识发生冲突,即经济体系的特征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或与之相关的“复杂性”(complexity)与“滞后效应”(hysteresis)概念——也就是说,任何特定时期的具体结果都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偶然组合方式又为下一轮不确定组合设定了条件。承认路径

① Giovanni Arrighi,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Anti-Systemic Movements*, New York 1989.

② E. J.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New York 1994, p. 5; 中译文在郑明萱译本基础上略有修改,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1914—1991》,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第 6 页——中译者注

依赖并非否定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总体理论的重要性。不过,它确实凸显出,在考察任何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动态时,要使此类分析站得住脚是何等的困难。

最后,阿里吉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从“黄金时代”到“铅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代巨变及其前景?他对当前时期金融资本崛起背后的广泛力量提出了独到见解,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贡献。然而,阿里吉的视角不够聚焦,充其量只能作为我们思考最紧迫问题的一般性指南,例如,金融资本究竟如何导致西方持续的经济停滞,以及何种政策举措和政治联盟才能挑战其权力。简言之,阿里吉既展现了宏大抱负的优势,也展现了过度扩张的危险——在社会科学中如此,在霸权政体的历史中亦然。